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

石 斌

内容提要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近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深层脉络,在战略实践中起起落落但从未销声匿迹。这些思想观念所塑造的全球战略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历史与思想线索。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美国 冷战 国家安全战略 战略观念 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最基本的战略要素之一,反映了一个国家带有根本性的安全

* 石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邮编:210093)

与利益需求,构成了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并以潜在、复杂的方式决定着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行为。战略思维是一套由国家战略决策体系内成员共享的、以稳定的战略价值观为基础的特定思维方式,它根源于战略价值观,形成于具体的战略实践和经验当中,左右着战略行为及其走向。^① 国家战略有两个层面,处于表层的是各个时期所实行的具体战略对策,包括方针、政策、计划等,是经常变化的;处于更深层面的是用以研究和处理战略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即在思考安全、利益、目标、力量、手段、途径等问题时的习惯性判断、逻辑推理方式及基本的态度与信念。战略思维方式又是以若干基本观念为基础的,这些观念是一国历史文化的积淀,是长期起作用的,只要它们不变,该国战略思考的方式、战略缔造的思路、战略实践的方向就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历史、社会制度、文化特质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战略思维观念和战略思维方式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②

美国历史虽不长,但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进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自身特有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尽管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因此,总结冷战历史经验,首先要回答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战后美国全球性主导地位的确立、巩固或维系,与冷战的形成、展开、转型和终结,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或调整之间具有何种联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战后美国历代战略精英如何界定美国的利益,如何判断内外威胁与挑战,如何评估本国能力并做出战略选择,以达到确立、巩固或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的?

要理解这些问题,至少需要考察彼此相关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是思想动因,即美国政策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及其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二是经验事实,即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行为的历史脉络与基本事实。本文将联系后者来着重讨论前者。

一、美国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的几个突出特征

理解美国安全战略与政策行为的思想根源,可以从外交传统、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战略文化等不同角度去探讨。本文无意拘泥于这些莫衷一是的概

① 赵景芳:《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7期,第29页。

② 吴昊:《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使命观”》,《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第84页。

念与术语,而是试图综合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期间,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中,美国人在战略安全观念和战略思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几个重要和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也是美国政治文化、外交思想或战略传统的反映。^① 表面看来,其他国家在特定时期或多或少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的思想倾向,但都远不如美国表现得如此突出、独特并具有显著的历史连续性。

(一)“历史在我们一边”:美国对外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

战后几代美国政治与战略精英普遍共享的一种政治价值观是认为美国式自由民主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和发展方向。他们大多持有这样一种主流战略观念: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具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同时又坚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这实际上也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或“新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NSC 68)集中反映了这一特征。文件的设计者们主张充分调动国家资源,维持广泛的海外联盟与前沿军事存在,尤其是在和平时保持庞大军事预算,以支撑美国及其盟国全方位、高水平的军事准备态势。但他们同时还担心,美国和西方体制的“完整性与生命力”会由于苏联体制的竞争与挑战而逐步被削弱。因此,第 68 号文件把冷战冲突描绘成“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把捍卫“自由”作为意识形态口号和道义旗帜。

上述观念导致了美国对外目标与对外行为的持续扩张性质,以实力为基础的强加于人,以及经常按捺不住的单边主义倾向等特点。这是美国进入全球霸权时期之后对外政策的基本特质。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也有类似倾向,但美国“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意识形态即“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深刻信念密不可分。美国权势的扩张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拓展总是相伴相生、并行不悖。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强权政治思想甚至“黠武主义”倾向,其特色就在于,以“特选论(上帝选民)”“天命观”“例外论”等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与精神动力,以美国实力优势为物质条件,试图通过武力等强制手段来推广美国“价值”、实现美国“理想”,而不只是满足于追求一般的物质“利益”。从冷战后一度得势的新保守派那里,仍然可

^① 笔者此前曾撰文表达过部分主要观点,本文是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参见石斌:《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史学月刊》2018 年第 9 期。

以清楚地看到此种战略观念的影响。主导了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那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其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武力手段与意识形态旗帜并举，与第68号文件的战略思想极为相似。

这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力图维护的是美国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s)，后者主要指那些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美国的对外战略是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旗帜并举。用亨廷顿的话说，美国人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乐善好施、无所不能”(uniqueness, virtue, and power)。^①实际上，美国人还倾向于认为自己总是清白无辜，喜欢把自己的对外干涉与霸权行为解释为“替天行道”、迫不得已或者“应邀称霸”(invited hegemony)，把黩武主义解释为面对威胁的正当防卫或惩恶扬善的正义之举。例如，美国决策者在制定冷战战略时常常强调，苏联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来达到目的，而美国出于道德考虑只是把武力当作最后手段，如果军事优势掌握在苏联手里比掌握在美国手里要危险得多。因此，保持“全面实力优势”是弥补“自由世界”“天生脆弱性”的唯一途径。而且，当西方的完整、活力和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时，应该“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来捍卫这些价值”。^②

“冷战”最特别、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意识形态对抗。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权势集团”^③都是“自由国际主义者”，“自由”即反共，“国际主义”即反孤立主义。美国代表了“正义”的一方，这是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随着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确立，美国人更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其卓越的民族特性，更加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山巅之城”“民主灯塔”。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秉持“天命观”的国家，永远不要低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对其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民主党人更讲意识形态，共和党更务实，但这只是表象。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明确宣称，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公正等原则，“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所有人来说都是真理”。^④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2, March-April, 1999年, pp. 35-50.

② NSC68, April 1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Vol.1, 1950, Washington, D. C. : GPO, 1977, pp. 218-219, 229.

③ 不知何故，“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这个已经在汉语中习用了几十年的说法，近些年突然变成了“建制派”。特别是就美国政治、社会与外交领域的精英群体而言，“权势集团”的译法远比“建制派”更达意、更一针见血。

④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p. 3.

过去几年许多人都在说特朗普是个商人,是实用主义者,只讲现实利益,不在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这些比较“虚”的东西。其实,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中美之间绝不仅仅是权力与利益竞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仍然是重要因素。近几年,特朗普政府尤其是一些鹰派人士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攻击与污名化就是明证。

(二) 霸权护持:美国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

另一个尽管众所周知但仍然必须指出的“美国现象”是,与“特选论”“天命观”“例外论”等核心理念密切相关的道德优越感与意识形态偏好,连同商业精神与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开疆拓土、无往而不利的历史经验,使得美国进入全球主义时代之后的对外战略,始终以确立、巩固或维系全球霸权为根本目标。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领导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天命观”“例外论”等思想为美国推行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念支撑,使其在拯救世界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曾说,“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成就赋予我们保护地球上自由的主要责任”,^①里根说“上帝已将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的命运交到了美国人手中”,^②小布什宣称“来自天国的召唤要求我们代表和支持自由”。^③为此,美国必须确立和维持全球霸权,充当世界领导,制定国际规则,但自己可以不受规则约束,“美国的行为有时候必须是例外的,因为美国的责任、价值观和能力都是例外的”。^④1940年,美国《时代》杂志说要创造一个美国世纪,奥巴马说还要让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美国必须做世界老大,而且不能有老二老三。美国全球战略有三大目标:安全、繁荣和“自由”。如果说安全与繁荣是各国都追求的目标,“自由”则是美国情有独钟、十分受用的“金字招牌”。美国霸权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或者说有三大支柱:(宗教与世俗意识形态)传教士搭台造势,商人唱戏谋利,军人保驾护航。强大的军事实力与联盟体系、主导性的经济贸易与金融地位,以及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影响力三位一体,共同塑造美国外交格局,支撑美国全球霸权。

^①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p. 6.

^② Ronald Reagan, “We Will Be A City Upon A Hill,” speech at the First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January 25, 1974.

^③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0, 2004.

^④ Kal J. Holsti, “Exception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 It Exception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3, Sept. 2010, pp. 380-404.

(三) “最坏假设”: 战略忧患意识与绝对安全观念

对外部威胁的性质及其轻重缓急的判断,是美国决策者制定或调整安全战略、选择政策工具和反应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就冷战和美苏关系而言,尽管美国朝野对于苏联行为的根源和苏联威胁的性质经常发生激烈争论,但总的来说,美国的决策者和政策设计者倾向于夸大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和美苏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因此,其主流战略思维是主张从最坏假设出发,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以应付哪怕概率极低的最坏情况。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安全观念和战略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谋求和维持绝对、全面的军事优势,争当“全能冠军”,追求绝对安全。

在保罗·尼采这类主流战略家看来,苏联这个对手与核武器的存在,是战后世界的两大基本现实。对于这两个事实的含义,美国战略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乔治·凯南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防御性的,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核武器对人类文明所构成的严重威胁,远比其他威慑作用或军事价值更值得关注。美国应该与苏联就核军备控制达成协议,从而以更加和解的态度和方式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罗·尼采则认为,没有人知道苏联的政策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而意识形态对立、战略竞争与现实利益冲突确实存在,为保险起见,对苏联的意图和行为只能做最坏估计,做最坏打算。没人知道苏联的意图是否将随着其能力的上升而发生变化,但“只有假定会这样,我们才会安全”。^①

这其实是美国战略家们普遍持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苏联对西方安全和美国“生活方式”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个假设,实际上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能够认定苏联不是强有力的对手和敌人,而是朋友、合作伙伴或者某种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继续奉行对苏冷战遏制政策就毫无道理、也根本没有必要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美苏实际上处于某种“囚徒困境”,只能靠揣测来理解对方的意图。许多美国决策者担心,如果把乐观假设作为政策出发点可能会犯下致命错误。万一凯南的判断错了呢?^②至于

^① August 17, “Review of NSC 68,” PPS Record, Record Copies, Box 69, NARA,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② “2nd Meeting of State-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 March 2, 1950, *FRUS*, Vol. 1, 1950, p. 177; “Charles Burton Marshall to George Kennan,” February 22, 1978, Nitze Papers, Name File, Box 29, Folder 5; “Paul Nitze to Louis Halle,” November 10, 1983, Nitze Papers, Name File, Box 29, Folder 5,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USA.

核武器,正因为其空前巨大的毁灭性,同时又无法保证苏联不会使用它,因此,许多人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这种威慑力量,哪怕仅仅是为了遏阻苏联或其他核大国的冒险行为。为此,必须及时扩充美国和北约的常规军力,而不是谋求核裁军。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不同形式的冲突做出相应反应,而不必过分依赖核报复战略。^①

总的来说,众多战后美国政治家,尽管主张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发生严重分歧,但出发点都是为了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可以说是美国几代战略精英在大战略目标上的一个核心共识。为此,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甚至过头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为总是担心自身力量的衰落或者其他大国的崛起对自己构成挑战,从而要求美国始终保持高度的国防战备状态,要求国防开支非常充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部署美国常规部队和战略部队。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所拥有的那种空前强大的世界地位,以及至今仍然拥有的超强军事地位,就思想和战略层面的因素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种战略意识或战略共识。问题在于,安全总是相对的。绝对安全固然是人人向往的理想状态,然而,放眼当今世界,除了美国,又有几个国家既有雄心又自以为有能力和资源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呢?

(四) “以实力求安全”:美国战略传统的军事特征

与“最坏假设”和“绝对安全”观念密切相关,美国安全战略传统的另一大特征,是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极度推崇。“以实力求安全”,是美国人所持有的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也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战略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由美国开国元勋肇其端,为历代众多美国政治、社会精英所承袭并发扬光大,几乎成为美国人在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的思想脉搏与文化基因。乔治·华盛顿 1790 年在国会提出的名言系众所周知:“做好战争准备是维持和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19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所谓“杰克逊主义”,是这一传统的突出表现。杰克逊主义代表了美国人的军事价值观,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拥有和运用武器的自由,高度推崇军事自豪与武力效用。^②冷战时期,这一传统的信徒们不仅倡导防务优先和军事优势论,还经常诉诸民粹主义,在他们的引导下,美国的公众舆论时常在要求战争方面走在政治家前

^① 更具体的讨论,见石斌:《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史学月刊》2018 年第 9 期。

^② [美]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95 页。

面,而战争一旦爆发,舆论都会强烈支持。^① 在冷战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集中体现了“以实力求安全”的战略原则,谋求全面军事优势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出于对苏联对外行为具有扩张性质及美苏社会政治体制本质上无法调和这一基本认识,一大批崇尚实力地位和武装戒备的美国战略家,始终立足于考虑应付最坏情况,以“宁可信其有”的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来设计冷战战略。他们认为,无论苏联的“意图”是什么,要保证安全万无一失,只能假定它具有破坏性,且力量越强大破坏力就越大,更值得重视的是苏联的“能力”而不是“意图”。这就是“以实力求安全”乃至以强大军事实力来保证绝对安全这种战略逻辑的由来。因此,他们强调军事准备优先原则,从而导致冷战的“军事化”,不仅使美国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和军事帝国,也使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严重安全困境。只是由于双方后来形成了核恐怖平衡,美国决策者才开始重视“战略稳定”问题。即便如此,保持和巩固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地位仍然是其战略思想的基石。在里根时期,这一原则被表述为“以实力求和平”。小布什政府的安全政策是冷战后的又一个典型,并且再次表明,这种现实主义传统还可以与美国式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偏好“混搭”,从而蜕变为某种极端化形式。美国新保守派这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所持有的战略观念,其特点就在于不仅追求绝对优势与绝对安全,而且倾向于用武力来实现美国理想、推广美国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更有意思的是,特朗普不仅自称是里根的拥趸,还直接照搬其“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与里根“重振国威”的口号也是如出一辙。

回顾历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战后以来的美国安全战略始终把武备放在首位,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这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两党政府共享的战略观念,只不过在某些保守派战略思想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其实,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内涵,或者说武力在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历届总统都直言不讳。杜鲁门在1945就说过:如果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继续做一个军事国家”。^② 70年之后,奥巴马同样宣称,美国“将永远维持自己

① [美]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第236—237、252页。

② Eugene R. Wittkopf, et al,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s and Process*, 6th ed., Cambridge: Wadsworth, p. 75.

的军事超强优势”。^① 2020年9月,特朗普甚至在联合国论坛上宣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无人能及。”^②从战后以来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中都不难看出,武力作为硬实力的核心,实际上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即使在吃亏碰壁后,或者政治经济处境不佳的所谓战略收缩时期,美国人对于武备也未曾有丝毫懈怠。这一点直到今天也很明显。有些人总是认为特朗普只想赚钱,不爱花钱。实际上美国的国防开支仍在增加,包括致力于核力量的更新,以及外层空间、网络空间和高技术等多个新兴战略领域的竞争。美国有时愿意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力量均势其实是迫不得已,一旦有机会它还是想掌握绝对军事优势,不断废弃冷战时期的重要军控协议就是例子。迄今为止,美国仍然维持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其实力甚至超过了其他排名前十余位的军事强国的总和。如果美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那显然不是因为缺少军事实力,而是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使然。

“最坏假设”“绝对安全”“以实力求安全”等战略思维与安全观念对于美国政策行为的深刻和持久影响,还可以从战略文化的视角来进一步理解。美国的战略文化具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和突出的冲突型特征,反映了“西方战略文化中的冲突与暴力传统”。^③ 就该类型所包含的主要方面而言,可以说美国战略文化的内核迄今未有根本性转变。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对外行为,常常力图把激进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与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结合起来,塑造一个没有对等竞争对手的世界。无论是打击所谓“无赖国家”,扩展民主,还是遏制竞争对手,都不排除采取战争行动。^④ 美国的这种“好战特征”被人们称之为“黠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⑤ 表现在国家安全政策上,它有内外两层含义:对内把军事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解

① 《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 2013 届毕业典礼演讲》,2013 年 5 月 24 日。<http://www.putclub.com/html/ability/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exercise/Education/2013/0806/74277.html>;《奥巴马在西点军校 2014 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 年 5 月 28 日,《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_4.htm。

② 2020 年 9 月 22 日,特朗普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视频讲话,<https://www.voanews.com/episode/president-trump-addresses-un-general-assembly-4427661>,2020-01-18。

③ 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 页。

④ 李少军:《全球重大武装冲突:现状与走势》,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章。

⑤ 例如,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葛腾飞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 London: Verso, 2003; Ismael Hossein-zade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Militar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2004.

决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①

“以实力求安全”在地缘战略上还表现为极具美国特色的军事同盟体系。联盟战略与“伙伴关系”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联盟既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力量支点,也是美国霸权覆盖的核心区域。历史上的大国霸权往往直接采取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美国霸权则更多地采取“借力”的方式,通过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构建其联盟体系,并要求盟友在政策上协调一致,在经济上相互让步,在军事上共同分担防务责任,从而形成一个合力围堵对手的战略网络。

(五)“技术决胜”:美国战略思维的工具理性偏好

美国战略思想的又一个突出特征,是将其全球战略建立在经济、军事与科技特别是新技术的综合优势之上。^②美国作为拥有战略优势的一方,在战略关系上秉持的信奉技术和力量的工具理性主义的基本理念及其对外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了冷战期间的战略稳定或战略安全关系的进程与态势。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观可以理解为:通过确保以核报复威慑力量为关键内涵的战略力量和技术优势,以及通过主导与苏联的力量角逐和战略博弈进程,从而达到对国际战略态势的主导性塑造。^③这其中不仅蕴含着军事上的“技术决胜”思维,也决定了美国在国际竞争中谋求和保持科技优势的基本目标。

美国的战略思维尤其是军事战略思维,非常崇尚科技能力,强调“技术决胜”。基于工具理性思维的“技术决胜”论,就是将军事战略优势的获取寄托在技术优势之上,认为军事技术的发展能为军事战略实践提供新的思维空间,保持军事技术优势是实现军事战略的坚实后盾,抢占军事技术制高点可以避免军事战略陷入被动境地。^④这种思想是“以实力求安全”理念的逻辑延伸和集中表现。

美国十分重视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纵观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历程,从掌握制海权、制空权到陆海空协同作战,从核威慑到信息化战争,无不与科技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技术领先始终被视为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

① 石斌:《美国“黠武主义”探源》,《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82页。

② 刘德斌:《概论美国国家战略思想的演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5期,第75页。

③ 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第64页。

④ 石海明:《技术决胜:美国军事战略思维特征评析》,《国防科技》2006年第9期,第69—70页。

要标志。在“技术决胜”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军事战略十分重视“技术突袭”和“技术预警”能力与机制的建设。“技术突袭”就是以独有的技术成果或压倒性优势突袭对手;“技术预警”则是指对潜在对手可能形成的“技术突袭”能力与行为及时发出警报。美国政府、军方与科学界和企业界密切合作,高度关注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随时跟踪、界定和评估未来可能威胁美国军事优势的重点技术领域,根据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及技术发展趋势来制定相应的技术发展战略,从而凭借综合科技优势确保美国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与作战能力的领先地位。

在工具—技术理性思维及维持全球性主导地位等目标的驱动下,美国力图谋求和维持高技术领域的全面优势,为此不仅强调科技创新,也非常重视国际技术竞争以及对潜在对手的技术遏制。例如,20世纪50、60年代与冷战对手苏联在军事技术领域的激烈竞赛,80、90年代与盟友日本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较量,以及近些年在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领域的对华脱钩和对华打压,尽管竞争对手的性质不同,竞争的动因与主要领域也不同,都体现了美国战略思维中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及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个方面,主要与美国在战略与安全领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关,还不包括国内制度等因素。事实上,诸如美国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安全体系及“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等国家安全“基础结构”,这些因素同样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安全战略,并且具有更多的稳定性与历史连续性。

二、美国战略思想与冷战实践

上述几大特征,当然只是美国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的部分特点,而且在战略实践中其影响也会有兴衰起伏,并不总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例如,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基于绝对安全观念的“防务优先”主张不得不让位于“预算平衡”需求;军事上的全面防御与有所选择的重点防御也时常相互替代;意识形态偏好有时也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利益需求,如美国出于战略需要寻求中美缓和时就可以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争论。《上海公报》共同声明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两国的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双方仍然可以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黩武主义与对外军事干涉在吃亏碰壁之后也会有所收敛,战略扩张在力不从心时也会进行收缩,如奥巴马对小布什的“纠偏”。但这些都是策略性的调整,一

些根深蒂固的战略理念即使暂时受挫也从未销声匿迹,随时会卷土重来。而且,诸如工具—技术理性思维和霸权护持目标等因素,则从来没有改变过。

同样,美国式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国际政治观念,也是经常纠缠在一起的,并无绝对界限。战后美国的战略家,大多集马基雅维里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思想于一身,只是在这两端之间各有偏重而已。按照伊肯伯里的论述,战后美国的全球大战略,依靠的也是两大支柱:以武力、遏制、均势、核威慑、同盟体系等要素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战略和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边贸易体制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战略。^①

简要梳理一下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在不同阶段的实施情况,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

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可以借鉴战略研究的一个常见的分析框架。这框架的核心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利益”“威胁”“反应”。更具体地说,评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变化及其成败得失,主要看决策者如何界定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如何识别这些利益遭受或可能遭受的威胁,如何选择最佳反应方式即运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资源来保护这些利益,以及如何证明这些反应方式的合理性。^②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总的来说都是遏制战略,但美国朝野经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发生争论,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该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经历过若干次调整。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遏制战略先后有六个版本。它们之间既有显著的连续性,也有一些重要区别。

首先当然是乔治·凯南的“原版”。凯南当然认为苏联是西方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但他主张“重点防御”,因为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四面出击。为此,必须明确界定并捍卫关键利益与主要地区,即五大工业—军事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英国、莱茵河谷(德国和中欧地区)及日本。只要苏联控制的中心不超过一个,便可大致维持均势。从这个逻辑出发,美国只需要对苏联进行“非对称反应”。就是说,时间、地点和反应方式要由自己选择,不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基于同样道理,美国战略的“优先考虑”就应该是通过联盟战略和重建这些关键地区的经济活力来稳住这些地区。在战略手段上,凯南主张综

^①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5, September-October, 2002, pp. 44-60.

^②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该书就是运用这一分析框架的代表性著作。

合运用各种力量工具,不能单靠军事力量,甚至主要不是靠军事力量,还要运用经济、外交、政治,乃至文化、意识形态这些手段,跟苏联长期比赛,最终拖垮它。凯南还特别强调,要始终牢记主要对手是苏联,坚持战略集中原则,不能到处树敌。其他国家只要不是站在苏联一边,不是积极主动的支持苏联,都应该成为美国争取的对象。这是凯南的本意。

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个“战略逻辑”或战略思维方式的问题,即每届政府主要决策者在制定安全政策时的战略思维方式,特别是他们如何看待“利益”与“威胁”之间的关系。凯南认为,应该首先确定自身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再看这些利益实质上受到什么威胁,然后再考虑应对这些威胁的手段。这个逻辑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依据利益选择手段,而不是根据苏联的能力来界定威胁甚至利益。

杜鲁门执政初期还有一点凯南战略的模样。但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保罗·尼采主持制定的国安会第 68 号文件出台,这实际上是遏制战略的首个实践版本,凯南的战略被修改了。^① 第 68 号文件强调全球范围的“周线防御”(perimeter defense),而不是重点防御;在战略手段上,优先考虑军事力量 and 全方位的战争能力,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灵活反应能力,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冷战战略的军事化。在战略逻辑上,第 68 号文件的制定者是根据他们所认识到的威胁来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这就反过来了。在加迪斯看来,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可能意味着受到威胁的任何东西都是利益。照此逻辑,苏联在某个领域的发展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在某个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也构成了威胁,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从苏联拥有的能力或影响力来理解自身的利益与需要,自己的需要就会不断膨胀,也就是说美国利益会不断扩展,而且,选择在同样的时间、地点,用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的“对称反应”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很重要的区别。

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保持安全与繁荣的“大平衡”,不能因为冷战把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生活方式”改变或摧毁了。所谓安全不仅仅是打败敌人或拖垮敌人,同时,自己还要能够继续较好的存活下去,不能两败俱伤。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就不太可能像 68 号文件那样搞全面防御,维持过高的国防开支。有什么办法能够做到既安全、又省钱?于是强化联盟战略,要求盟国分担更多责任;依靠核威慑,在军事上奉行

^① 关于 68 号文件的出台经过和主要内容,详见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三章,第 59—115 页。

“大规模报复战略”，对威胁进行“非对称反应”。

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美国到底应该对非殖民化问题采取什么立场？如果支持非殖民化，欧洲盟国肯定有意见；反对非殖民化，发展中国家当然更不满。这是美国当时面临的一个“道德困境”，而且苏联人很善于利用这一点。

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安全战略叫“灵活反应”，实际上又回到了68号文件的思路：减少对核威慑的依赖，代之以全面、多样、灵活的反应方式，而这又要求对威胁进行直接、对称反应。其中的战略逻辑也非常相似，根据威胁，根据苏联能力反过来考虑美国的利益所在以及反应方式，又回到了这个逻辑。威胁造成了“利益”，于是需要做出反应，于是需要拥有反应的能力，即使是在那些原本并未被视为“利益”的领域或地区！美国的安全战略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因此，看起来经常在调整，但同时又有惊人的连续性。

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为了对付苏联，美国可以“承担任何重荷，付出任何代价”。战略手段上的重点又放到了军事能力上，相对于经济和政治反应，更加强调军事手段，而这又意味着必须增加国防预算，于是放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承诺的预算平衡，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金融政策来刺激经济。美国的安全政策总是在军事安全与经济繁荣这两个目标之间摇摆。这种军事优先，灵活、对称反应的战略，导致了越战逐步升级。

到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他们认为世界已经由两极转向多极，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所谓“缓和战略”实际上是回到凯南所设想的“多极均势”。在军事能力上，“充足论”取代了“优势论”。在战略逻辑上，与凯南也很相似，不能被对手的行为所左右，首先要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对手的能力或意图为出发点。这个逻辑又倒过来了。寻求中美和解以制衡苏联，这也比较接近凯南分化东方阵营、力求战略集中的思路。

里根政府时期可以说是全面回到凯南遏制战略的原始版本。例如，在不排除必要的对称反应的同时，主要采用非对称战略。非对称战略就是我要有主动权，对称等于让人家掌握了主动权。特别是1985年以后整个冷战进入尾声，形势出现戏剧性的变化。里根（老布什更是如此）更多地利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些相对软性的东西，而不只是甚或主要不是靠军事力量，所谓“和平演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苏联已经很困难了，苏东集团内部紧张接近瓦解边缘。里根总统在柏林演说中公开呼吁“推到柏林墙”，意在占据意识形态与“道德”制高点，加剧苏东矛盾，使苏联陷入两难困境，如

同苏联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对付艾森豪威尔那样。

里根政府时期的战略受到加迪斯等冷战史学者高度推崇。其实这不过是“事后诸葛”，未免言过其实。里根时代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都在抬头。实际上，里根的“成功”未必是因为他能够主动“造势”，他不过是顺势而为，及时调整政策，从“新冷战”转向终结冷战，对苏东落井下石外加因势利导。凯南、杜勒斯等人都曾经说，苏联的根本变化恐怕还要寄希望于其内部出现一个愿意变革的人。里根运气不错，碰上了戈尔巴乔夫。

从遏制战略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战略争论与政策调整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在防御范围上，是重点防御还是全面防御；在手段上，是采取综合手段还是主要依靠军事手段；在反应方式与军事准备上，是对称反应还是非对称反应，是依靠全面、多样、灵活的反应能力，还是主要依靠核报复能力，是谋求军事优势还是维持战略稳定；在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天平上，是防务优先，还是经济为重；更重要的是，在战略思维与战略逻辑上，是根据对手的威胁来界定自身利益，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界定威胁；就“威胁”而言，是主要看对手的意图还是其实际能力。

凡此种种，看似十分复杂，实际上不过是在两端之间来回摇摆，而且具有二元思维的倾向。这不仅反映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利益界定、威胁认知和手段选择及其相互关系与轻重缓急等问题上的观点差异，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美国所追求的极为广泛的全球利益和战略目标，与实际可用的手段、能力、资源之间的持续张力。这种紧张关系，既源于国际格局与国内环境的不断变化，也与美国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中的许多深层因素有关。至少，对于苏联挑战的基本性质、自身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普适性”，以及遏制战略的基本目的乃至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美国决策者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分歧。

这其中的基本思想分野实际上就是凯南和尼采所分别代表的两类遏制战略主张，或者说“长电报”和第 68 号文件构成了坐标的两端，但二者都在“冷战共识”的大范畴之内，并非完全相互否定。这两个美国冷战战略的经典文本固然有许多重要区别，尤其是在如何捍卫西方的利益和价值、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与战略思想界长期并存、相互竞争的两种思路或“两条路线”，但它们在冷战战略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目标等更大的方面有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首先，两份文件的出台都有其特殊背景。凯南的“长电报”是在斯大林的一次重要讲话之后。这次讲话宣称苏联与西方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第 68 号文件的背景则是苏联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严重的事态。因此,两份文件的的目的都是对美国的安全与战略环境做出评估,并就美国战略调整提出建议;其次,两份文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断言苏联对美国 and 西方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并认为美国必须迅速、果断、有效地抵抗这种威胁;再次,两份文件所体现的政治原则都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思路,但同时又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第68号文件相对更为突出。^①

不无反讽意义的是,尽管凯南早已置身权力中心之外,而尼采则堪称政坛“不倒翁”,而且看起来尼采的路线更受欢迎,更能反映主流战略思维,然而,从美国冷战战略的实践来看,相对更为成功的战略却往往更为接近凯南遏制战略的原始思路,而不是尼采等人的主张。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当本文所讨论的某些美国战略安全观念和战略思维特征被推向极端时,常常是得不偿失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许多美国冷战史学者,包括自称要对美国安全战略进行“批判性评析”的加迪斯,他们对于美国历届政府遏制战略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其成败得失,哪届政府的遏制战略最有效、最成功,对于美国的冷战目标和遏制战略本身的合理性,却很少提出过质疑。加迪斯后来甚至认为,冷战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目的是为了证明究竟“谁对谁错”。因此,我们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知识关切。试想,如果美国人在讨论对华政策时,争论的仅仅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遏制中国甚至“战胜”中国,我们是不是应该反问一个为什么?这种对抗性的政策有何道理?还有没有其他对双方都更有利的选择?实际上,即使在美国,也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凯南尤其是尼采等一大批“冷战斗士”,冷战或许早就结束了。历史作为事实固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人类在未来做出更好的选择。

结 语

美国走向世界性强国的历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对外扩张是一个经久主题。从立国到1898年美西战争,其核心目标是国家建设与大陆扩张;从美西战争到“珍珠港事变”,是着重在拉美和亚洲扩展利益的所谓地区主义时期;

^① 关于两份文件的具体内容,详见石斌:《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第105—107页。

此后就进入了全球主义时期。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进程中,美国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文化、外交思想与战略传统。美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主要是在 20 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美国所奉行的全球战略及其背后的主流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息息相关。综合考察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有几个影响至今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

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历史实践表明,上述思想特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也会有兴衰起伏,未必总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它们构成了美国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的深层脉络,不仅从未销声匿迹,而且历久弥新。杜鲁门政府的 68 号文件、里根政府的“重整国威”、小布什时期新保守派的战略抱负,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无不贯穿着“以实力求安全”的基本理念。更有意思的是,围绕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国内经常有所谓保守派与自由派、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争论,但旨在凭借美国实力“领导世界”、按照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全球主义始终是美国成为世界性强国之后的外交主旋律。其中,软硬两手抓,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堪称“现象级”的美国传统战略思想。“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不仅适用于冷战后的新保守派战略家,也是对美国主流政治与战略精英群体的一个生动而又恰如其分的概括。

美国的对外政策偏好与对外行为特征,植根于它的发展历程、政治文化与战略传统,立足于其超级强国地位,既没有因为冷战格局的瓦解而改弦更张,更不会因为某届政府的更迭而立刻发生质变。因此,不能因为美国社会经常出现的一些“变革”因素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脱轨”现象,便轻易忽视其社会政治生活所具有的显著连续性以及历史与思想的“惯性”。

事实上,美国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并不总是使美国“从胜利走向胜利”。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事件后,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与此类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密切相关,美国不仅时常面临着帝国“过度扩张”或“战略透支”的现实与潜在危机,也会陷入战略上的自相矛盾和进退失据的境地。当今美国在全球所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者说正在显现的某种“帝国的困境”,都可以从冷战历史中找到根源。总之,美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哪些因素具有重要的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影响力,对于理解当下和未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有什么启发性,这是我们研究冷战史和美国冷战外交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